

# 风险社会理论新探



刘岩 著



Exploration of  
Risk Society Theor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风险社会理论新探



Exploration of  
Risk Society Theor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险社会理论新探/刘岩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 - 7 - 5004 - 7136 - 3

I. 风... II. 刘... III. 社会学—研究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8576 号

责任编辑 王 曦  
特邀编辑 黄德志  
责任校对 易 凡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版式设计 戴宽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插 页 2

印 张 16.25

字 数 260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代序 发展的标准与选择

孙正聿

20世纪80年代，吉林大学在国内率先创立了社会发展研究所，90年代中期又组建了哲学社会学院，并在2004年成立了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吉林大学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心，对社会发展理论展开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发展，在其真实的意义上，是人的特殊的存在方式，也就是以社会的发展而实现人自身的发展的存在方式。人的这种特殊的存在方式，既是当代人类面对的最大的现实问题，也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争论最激烈的理论问题。这是因为，趋利避害的人类生存逻辑，在当代人类的实践活动中、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社会的发展中，受到了空前的严峻挑战。

发展问题的严峻性在于，发展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它具有不可避免的二重性。人类的历史就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它总是以某种“退步”的形式而实现自己的“进步”，“片面性”是历史的发展形式。历史过程中的任何进步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任何正面效应都会伴生相应的负面效应，任何整体利益的实现都意味着某些局部利益的牺牲，任何长远利益的追求都意味着某些局部利益的舍弃。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说，恩格斯早就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就必然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社会发展研究中的重大课题。

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说，马克思曾把市场经济概括为“以物的依赖性

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体制的意义上，经济全球化首先是市场经济及其原则的全球化。市场经济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塑造全部的社会生活，也就把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优胜劣汰的原则融入整个社会生活，这不仅塑造了人的“独立性”，而且构成了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利益最大化的逻辑，而不是幸福最大化的逻辑，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生存逻辑。对于人类来说，这个生存逻辑是对人类自身的“趋利避害”的生存逻辑的严峻挑战。马尔库塞说，“发达工业文明的内在矛盾正在于此：其不合理成分存在于其合理性中”。这就是当代人类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所面对的最为严峻的发展问题。

把“发展”作为最重大的现实问题而予以研究的社会发展理论，它所面对的理论问题，首要的是对“发展”的理解和评价问题。发展，这不只是对存在状态和存在过程的描述，而且是对存在状态或存在过程的评价，因此，“发展”是以评价为逻辑前提的对存在的描述。这表明，“发展”问题的实质是对存在状态和存在进程如何评价的问题，以及依据某种评价的标准作出行为选择的问题，即在实践中作出各种顺序性安排问题。作为人类生存逻辑的趋利避害，“利”与“害”的标准如何确认，怎样的行为选择才是当代人类的真正的趋于“利”而避于“害”，怎样的顺序性安排才能使“利”大于“害”，这是当代社会发展所面对的根本问题。“标准”与“选择”构成社会发展理论的至关重要的核心范畴。

“发展”的标准具有极为深刻、极为丰厚的文化内涵。它既内涵着文化的多样性，又内涵着每个时代的“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它既内涵着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又内涵着现代化的多元选择；它既内涵着“历史的大尺度”，又内涵着“历史的小尺度”。所谓历史的“大尺度”，就是以人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的反观历史的尺度；与此相对应，所谓历史的“小尺度”，则是以人的“非根本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为出发点的规范人的历史活动的尺度。生活本身告诉我们，当我们离开历史的“小尺度”而仅仅承诺历史的“大尺度”的时候，我们不仅无法实现“大尺度”所承诺的价值理想，而且尤为惨痛的是会使这个“大尺度”所承诺的价值理想变形，把“大尺度”变成某种压抑个人发展的“本质主义的肆虐”；与此相反，当我们离开历史的“大尺度”而仅仅着眼于历史的“小尺度”的时候，我们不仅会失去“大

尺度”的价值理想，而且尤为严峻的是使这个“小尺度”所规范的历史活动危及人自身的存在，从而使人们在这种“小尺度”中感受到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也就是形成了“以人为本”的关于“发展”的根本标准。这个“标准”作为“历史的大尺度”与“历史的小尺度”的“微妙的平衡”，构成了我们的行为选择的出发点。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以这个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中国政府正在致力于解决社会发展的三大问题：一是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致力于解决公共利益最大化、满足全社会基本公共需求的民生问题；二是致力于解决资源环境体系的压力问题，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致力于解决公共治理结构中的政府自身建设问题，推进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这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下的行为选择，也就是我们在经济全球化中对现代性的行为选择。

作为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需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在充分汲取国外学者的成果的基础上，推进我们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我感到，解放思想，首先需要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气魄。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是前所未有的，同时，我国发展面对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就需要我们以宏伟的气魄和开阔的视野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解放思想，还需要有直面现实的凛然正气。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不断地凸显出来，它要求理论工作者以直面现实的凛然正气去研究这些深层次矛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来回答这些重大的现实问题。有了这种凛然正气，才能真正地解放思想，提出和探索新问题。解放思想，还需要有创新的理论勇气。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解放思想并不只是一个口号，它要求我们：一是要从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当中解放出来，认真地、深入地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而不是对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实践作出某种简单化的判断和评说；二是要从唯上唯书、人云亦云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从我们面对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出

发，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提供具有创新性的理论研究成果；三是要从僵死枯燥、言之无物的话语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凝练新的思想和新的语言，作出新的论证和新的阐释。

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的自我意识，它的关切点总是自己时代的最为重大的现实问题。人类的趋利避害的生存逻辑，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遇到了空前的挑战，并构成我们时代的诸多的重大课题，引发了我们的共同的关切与期待。愿本丛书的出版能够切实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深入研究。



## 序

在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社会差距越来越大的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了风险社会的问题。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系统地阐述了风险社会的思想。贝克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人类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他指出，“正如现代化消解了19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构并产生了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的现代化正在消解工业社会，而另一种现代性则正在形成之中”<sup>①</sup>，即伴随着社会风险的“反思现代性”。他认为，工业社会的中轴原理是分配财富，分配好处；而风险社会的中轴原理是分配风险，分配坏处，分配危险。<sup>②</sup>他所说的风险是指那些业已存在、面向未来的种种有危害性的不确定因素。风险既是可能性，也是现实性；既是本土的，也是全球的。

实际上，在贝克之前，法兰克福学派、罗马俱乐部等都提出了相近的思想。哈贝马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国家的干预活动增强了，而这种干预活动必然保障制度的稳定性；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密切，而这种密切关系使诸种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国家干预和科技力量的增大，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经济风险和合理性风险的反映，即“反映为了特定利益的社会化生产与驾驭规则之间的矛盾。这种风险趋势以国家机器失控的方式，转化为丧失合理性”<sup>③</sup>。罗马俱乐部认为，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具有破坏性，高速发展的经济已经远远超越了合理的生活需求，越来越变成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全球化的进程使得这一切成为威胁人类的全球性问题。佩奇

---

①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② 同上书，第15页。

③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说：人类未来的生存条件及其实质内容，是由人对栖息在地球上的其他生物的态度而决定的，起决定的程度是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正在缓慢进行的生态灭绝，人类今天应当负责任，这是他们贪婪的、缺乏预见性的日常活动的结果。他和核武器的大屠杀这一冲击性的大事件一样，可以导致人类彻底毁灭。佩奇惊呼：“如果不改变某些实为自杀的行为，那么，我们不久也将加入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红皮书中而落到‘险境动物’的地步了。”<sup>①</sup> 和传统社会相比，当代社会的确已经进入了高风险时期。进入 21 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趋势，是社会活动性质的利害两重化。

人的本质活动是实践。马克思说：“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们有意识的人类的存在物……的自我确证。”<sup>②</sup> 实践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对人来说，自然界需要从自然物升华为属人之物，成为符合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的对象，这一过程不是自然发生的，需要人在实践活动中创造。然而这种创造往往是不可逆的，特别对利用不可再生性资源创造出大量人工合成制品的工业实践来说，尤其如此。人可以把石油转化为塑料，但人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把塑料转化为石油。即使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前提是必须再发明一套用于还原塑料的技术和设备。于是麻烦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塑料虽然被还原了，可又留下一堆设备挑战似的看着你。于是，为了恢复平衡，你必须再发明一套用于还原塑料技术的技术，如此类推，人类就变成了古希腊神话中的西绪福斯。人也许没有必要殚精竭虑去还原自己创造的成果。但是，由于创造是改变自然，在自然中不断添加自然自身不能产生之物，那么，任何一种创造都可以看成是对原生的自然状态的破坏。

实践的破坏性具有多重含义。一重含义是指创造对改造自然、改变自然平衡来说，是一种破坏。人类社会的平衡、人与自然的平衡是建筑在破坏自然平衡基础之上的。人不改变自然，人不成其为主体；人若改变自然，就撕裂了人与自然、自然内部的原始平衡。破坏原始平衡对人来说是好事，它使人类告别自然界，从野蛮走向文明。但正如恩格斯告诫我们的那样：人类不要陶醉于自己对自然界的胜利，人类每一次对自然界的胜利

<sup>①</sup> 池田大作、佩奇：《21 世纪的警钟》，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5 年版，第 11 页。

<sup>②</sup>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0 页。

都遭到了自然界的报复和惩罚。在这个星球上绝没有不付代价就取得收获的好事。为了对抗大自然的惩罚和报复，人不得不创造更为高明的技术手段去对抗。另一方面，实践的破坏性还在于，实践结果一经形成，就独立于人自身之外，成为人必须面对、必须控制的外在力量。这便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实践创造出来的成果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存在，存在着不受人的控制，反过来却控制人的可能性。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着，并成为与他相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贯注到对象中去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力量同他相对抗。”<sup>①</sup>

因此，实践既具有创造性又具有破坏性、既肯定人又否定人的双重特征，就是实践对人既有利又有有害的利害两重化。人的实践能力越强，创造性就越突出，破坏性也越明显。现代社会实践越来越体现出利害两重化的特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水平的提高，人们在创造巨大财富和人间奇迹的同时，也深深地为实践的副作用所困扰。

毫无疑问，人类有今天，大半功劳非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莫属。但是，科学技术作为一种人创造出来的客观力量，对人究竟有利还是有害，主要在于人对它的控制和使用。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科学技术进步，莫过于核能的开发和利用，但核能第一次派上用场就是作为核武器去屠杀发明者的同类。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提高了人类实践的水平，而且一步步使人类自身成为人最需要征服、控制的对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远远突破了加工、改造、利用自然的简单劳作阶段，随着核技术、生物工程、遗传工程的发展，人正在催发那些沉睡在自然之中的巨大而恐怖的自然力，制造出大自然不曾赋予人的新的物种、细菌，甚至有可能改变人的物种。人类正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在科学海洋里游弋。

工业和农业的根本区别在于，农业主要是驯化自然，利用自然，其劳动成果仍然保持自然状态；而工业则主要是把自然物加工成纯人工的产品，其劳动成果基本上脱离了自然状态。农业虽然把原野开垦成耕地，把植物培育成庄稼，把动物驯化成牲畜，但耕地仍然是土地，庄稼仍然是植物，牲畜仍然是动物，它们仍然遵循其原有的自然规律。但机器不再是石

<sup>①</sup>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头，许多工业产品不能自身还原为自然物。工业化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产生出越来越多的非自然的、不可还原的人工制品。面对废气、塑料、工业垃圾，大自然往往一筹莫展。工业化的第二个后果就是它主要依赖、消耗着不可再生的资源。农业资源大多是可再生的。但是，工业资源则不然，工业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不断地“消灭”着自然，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制造自然自身吸纳不了的垃圾，其结果就是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

当代人类社会活动性质的利害两重化给当代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首先，人类活动的主要对手已由自然逐渐过渡到人类自身。在农业社会，人类活动的主要对手是自然。在工业社会，人类活动的主要对手是原料和能源。在当代社会，人类活动的主要对手则转向人自身及人所创造的文化成果。人类必须首先征服自己，征服自己的产品，控制它们，驯服它们，然后才能合理地改造自然。

其次，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由征服自然、统治自然转向协调和保护的关系。自然不仅是人需要战胜的对象，而且更重要的是人赖以生存的环境。发达的人类社会同样需要一个相对应的环境。环境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人可以认识、掌握自然规律，也可以利用、改造自然事物，但最终也不是消灭自然，而是使之更适应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农业社会，人们靠天吃饭，只能在强大而又神秘的自然力面前顶礼膜拜。工业社会的来临呼唤出前所未有的人类创造力，提高了人的自信心，强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要么是需要战胜的敌手，要么是被打败的奴隶。而进入当代社会，自然既不是敌手也不是奴隶，而是人的另一半，是人的家园和归宿。

再次，人类思维的中心也从历史逐渐地转向现实乃至未来。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是手工劳动，以个人经验积累为主要的技术方式，看重历史，习惯于“向后看”。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是大机器社会化生产，以通用型的技术为主要技术方式，且更新极迅速，故不重历史，而重现实。后工业社会的生产是信息化的前导方式，以科学技术、理论知识、信息技术为主体，加速倍增，信息一体，利害两重，故需加强活动的预测性，根据未来的发展指导现实，实践具有极强的超前性。

最后，人类的文化精神从近代的自我迷信转向自我反省。近代人类的文化精神的实质，是一种自我迷信。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运动到理性主

义运动，人类推翻了宗教神学的权威，代之以对人自身的崇拜，主张人性至善，理性至上，个性至尊。但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充分展示了实践的利害两重性，人类才开始从盲目的自我迷信中猛醒。戴维·埃伦费尔德提醒我们要防止“人道主义的人性僭妄”；佩奇惊呼：“进入历史危急时刻的当代人，再也不能无视全人类所处的险境和未来的选择了！”<sup>①</sup>一种呼吁人类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自我控制的当代文化精神，正笼罩在人类心灵的天空。所以，当代社会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建构和谐社会，正是对风险社会的合理的、自觉的、积极的反应。

本书是刘岩同学的博士论文。作为他的导师，曾就此文的写作与作者多次交流过。正像答辩委员会的评价一样，这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本书较系统地分析了风险研究的各种理论，做了大量的文献工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风险社会理论的思想脉络和理论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批判，就类性风险、风险文化的二重性、风险意识启蒙、风险责任伦理等问题提出了自己颇有创见的观点，在学术上很有启发性。研究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现实关怀。希望他以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不断地深化对风险社会议题的理论和经验研究。

郅 正

2008年6月1日

<sup>①</sup> 佩奇：《世界的未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27页。

## 导言 风险社会理论:审视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维度

对现代社会发展后果的审视是当代社会理论的重要议题。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从不同视角观照现代社会发展后果的术语,就有“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等。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整体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变迁,也带来了社会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传统社会学主要立足社会内部进行研究的理论范式受到挑战,面临着难以驾驭的困境。在这种局面下,当代富有洞察力和预见性的社会思想家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等人,“从不把自己的研究称做‘社会哲学’或‘社会学理论’,而是冠名为‘社会理论’,其意在于强调,研究任何社会现象,都不可脱离对构成人类行为之背景的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依赖和制约,换言之,社会结构和文化既为人的行动提供了资源和手段,也是它的条件和限制,二者同样不可须臾或缺。”<sup>①</sup> 社会理论的形成是与“现代现象”及其“现代性问题”纠缠在一起的<sup>②</sup>。社会理论从其将整个社会及其变迁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来看是一项跨学科的事业。

社会理论对当代社会重大变迁的审视,突出表现为对现代性及其后果的“诊断”,而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对现代社会风险症候的关注,并将全球性人为风险界定为当代社会及未来社会的一种结构品质。20 世纪后半期以来,现代社会的高度风险性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如贝克、吉登斯、拉什(Scott Lash)、卢曼(Niklas Luhmann)等都对此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形成了当代风险社会理论。这

---

<sup>①</sup> 苏国勋:《〈社会理论译丛〉丛书序言》,《社会学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 页。

<sup>②</sup>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前言,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2 页。

些社会理论家虽然从不同角度来研究现代社会的新特性，但都共同敏锐地预见到一个新的风险社会的来临：当代社会的突出特征在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和一些始料未及的风险或者说“副作用”，在未来若干年内人类将面临激烈的社会矛盾和严重的生态危机<sup>①</sup>。

风险社会理论，与其说是某个流派的学说，倒不如说是从“风险整体转型”的视角来审视当代社会重大变迁的观点和看法的统称。如果仔细阅读风险社会理论奠基人贝克和吉登斯的主要著作，就“可以发现到‘社会的巨变’是两位作者所凸显的主要意象，也是其理论发展的主要观照点。”<sup>②</sup> 他们往往不是简单地对现代社会持悲观或乐观态度，而是对以西方为范本的现代性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从而触及了西方现代性的基础。风险社会理论家对风险社会的分析不是孤立的，而是将风险置于当代社会变迁的宏观考察之中，风险社会理论与对现代性的反省密切相关。风险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反省首先是指审视和反思工业现代化所带来的危机及其副产品，并由此建构“二次现代化”（“现代化的现代化”）的新理论，以走出风险社会的困境。风险社会理论最初是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而提出的。吉登斯认为，在一般的理论形式中，“社会学一直被看作是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普遍性知识，人们可以用它来预测和控制社会生活。”<sup>③</sup> 雅斯贝尔斯认为：社会学就是现代社会接受自我认知的一种科学形式。<sup>④</sup> 卢曼认为，社会理论是现代社会的自我反思和自我理解的系统形式。<sup>⑤</sup> 从这个意义上讲，风险社会理论凸显了当代社会风险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自觉，代表了人类自我反省精神的高度成就。

现代社会的高度风险性作为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应该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野之中。马克思主义在审视当代社会风险及其理论问

① 参见周战超《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引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第53页。

② 刘维公：《第二现代理论：介绍贝克与季登斯的现代性分析》，顾忠华主编：《第二现代：风险社会的出路？》，（台北）远流图书公司2001年版，第1页。

③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④ 雅斯贝尔斯：《论韦伯》，鲁燕萍译，（台北）桂冠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转引自顾忠华：《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韦伯作品集——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导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⑤ 参见刘小枫《选编者导言》，《宗教教义与社会演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题上，无疑拥有着总体性分析和批判性考察的独到视域。马克思主义立足人类实践活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发展规律及其演进趋势，为我们反思当代社会风险问题和批判风险社会理论提供了广阔而深刻的理论视野。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地吸收风险问题研究的相关理论，突破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局限，进而拓展风险社会理论的审视维度就成为本书的主旨。这无疑也具有双重的意义：从理论意义上看，风险社会理论的批判与拓展不仅有助于澄清和丰富风险社会理论的观点和内容，而且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发展和 innovation；从现实意义上看，风险社会理论的合理建构有助于全球化时代人们树立科学风险观念，正确认识和把握风险整体转型问题。在当代中国，伴随着风险问题的凸显，发展与风险的关系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把握的重大问题。如果说正确处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是事关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保证的话，那么，正确处理发展与风险的关系就成为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批判与拓展，还是从风险社会理论看构建和谐社会都是在前一问题基础上的深化与升华，对后一个问题的深入探讨。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正是本书的价值关怀所在。

从现有研究来看，国外学术界对风险问题已经展开从不同学科从不同视角和层面的研究，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流派和纷繁复杂的理论观点，但缺乏从社会发展哲学的理论高度来审视这一重大问题。虽然在吉登斯的理论中，已经自觉地将风险与人的存在方式联系起来讨论风险与“本体性安全”的关系，但仍然局限于现象描述层面而缺乏系统深入的专门论述。贝克针对风险社会的出路提出了“第二次启蒙”的构想，这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触及了风险症候的人性根基，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但正如其所指出的是，这仍然只是他当前努力的方向，尚未形成系统化的成熟的理论成果<sup>①</sup>。从国内研究来看，社会理论层面的风险研究还处于起步阶

<sup>①</sup> 从人性视角解读风险问题，也是当前贝克等人的研究主题。贝克指出：“对我来说，启蒙不是一种历史概念和一系列观念，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批评、自我批评和人性起中心作用（目前我的研究主题）。”参见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政治学》，刘宁宁、沈天霄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3期，第46页。

段，有深度的研究还十分欠缺。这表现在：一方面直接引用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并把“当代社会视为既成的风险社会”，以此作为分析框架加以广泛运用，而没有注意到它内部存在的诸多有待澄清的问题；另一方面，国内学界自身对当代风险问题的独到研究寥寥无几。近年来，随着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著述的翻译和介绍的不断增多，风险问题已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同时“非典”等现实问题的促发也使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但现有研究大多流于现象性描述或观点性介绍，缺乏理论建构，因而有待深化。

基于以上认识和考虑，本书选择“风险社会理论新探”作为论题，并试图在六个方面对论题进行研究：第一章，社会风险与当代社会发展；第二章，当代风险问题研究的理论自觉；第三章，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解析；第四章，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审视；第五章，风险社会理论的拓展；第六章，风险社会理论视野中的和谐社会议题。





# 目 录

代序 发展的标准与选择 .....	孙正聿(1)
序 .....	郝正(1)
导言 风险社会理论:审视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维度 .....	1
第一章 社会风险与当代社会发展 .....	1
第一节 风险问题的历史演变 .....	1
第二节 当代社会风险问题的凸显 .....	5
第二章 当代风险问题研究的理论自觉 .....	13
第一节 风险概念的历史考察 .....	13
第二节 当代西方风险问题研究的范式转换 .....	16
第三节 风险问题研究的理论背景 .....	25
第三章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解析 .....	38
第一节 贝克和吉登斯对风险问题的解析 .....	38
第二节 风险社会的理论阐释 .....	58
第三节 风险社会理论的修正 .....	84
第四章 立足马克思主义的审视 .....	95
第一节 审视风险社会理论的维度 .....	95
第二节 异化与现代社会风险根源 .....	107
第三节 风险社会生成机制的唯物史观考察 .....	124